

生态诗学引论

马永波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生态诗学引论

马永波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自序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大自然正在降级变为我们的环境。现实已经不再表现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持续-储存（standing reserve），而展示为已被耗尽（Already used-up）的废物王国。据统计，在 1972 年到 1999 年间，英国云雀的数量减少了 60%，树雀的数量减少了 87%。^① 人作为废物制造者使废物进入人的自我，成为人的一部分。格伦·A·洛夫在《重估自然——走向生态批评》中开列了可能的和实际的灾难目录：

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对硕果仅存的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

^①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Edited by Laurence Cou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3.

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①

“生态”已成为 21 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与此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现代性所标举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理性中心主义既是导致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源，也对人的精神生态失衡与人文生态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众所周知，舍勒曾将现代性的问题简括为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之正当性基础的重新论证，他认为人心秩序（心态气质）是世界的价值秩序的主体之维，心态气质（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转型更为关键。一旦体验结构的品质发生转变，对世界之客观的价值秩序的理解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代的体验结构的转型中，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使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这种伦理意识结构正

^① The Ecocriticism Readers,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226.

是每一时代和民族赖以作出具体价值评价的基础。^① 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也正是舍勒所言之“同情共感”，它是明显分化和有差异的价值感的共同体基础。

这就是本书的展开背景。其基本思路为，从对现代性的考察入手，探察现代性内部的危机所在，亦即现代性所鼓吹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已经使得自然生态受到难以复原的破坏，从而危及到人类生存本身。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在此普遍困境中以审美现代性代替启蒙现代性，以期在文明荒原上寻觅到出路，虽则勇毅，却也难逃注定失败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则从解构的角度，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所设定的等级制，试图重归事物本身。而以深层生态学为助的生态文学，推动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过渡，强调万物共生互相效力的因缘整体，因此构成当代文学乃至文明的又一个新的转型。消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而是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逼迫我们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对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贡献，最终一定也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

生态关怀已经不囿于文学，而是真正走上了伟大文学不仅仅存在于与历史的关联之中，也同时置身于与宇宙的关联之中这个终极梦想之旅。在国外，生态文明的研究在当代文化中已经成为

^① 参见《舍勒选集》编者导言，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一种显学，在文学出版界也形成了一种气候。比如说，美国文学的活力、生机，甚至美国精神都是与其自然环境密切相连的，要把握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最新趋势与内涵，就必须把握住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学界也开始高度重视生态主义这一新的文化思潮。作为英美后现代诗歌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翻译者和研究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起，我逐渐意识到，现代性危机的应对之策，从现代主义的对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其策略中均存在着难以化解的悖论，就在这时，随着我个人在汉语诗歌写作中所实践的“客观化”诗学的逐渐完善，我梳理出了一条汉语写作的新的路向，也可以说，我的思路与生态整体主义不谋而合。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开始有意识地策划主编生态文学的译丛，并对生态批评及其理论来源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我发现，这个新兴的潮流还不很成熟，还需要从各种资源中提炼出自己的思想营养，以形成体系化的话语。于是，我决定在译介相关资料的同时，更要参与其理论建构，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探索文学的功用，将生态学思想与文艺美学融合起来，对当代文艺新的转型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概括。

本论著的一个重要理路是不仅仅将生态环境局限于人与自然，而是扩展到一切人工造物，直到宇宙整体。伯克特（Birkert）就认为环境不一定非得意指“自然的”或“荒野”领域，它同样包括被耕作和建筑的风景，这些风景的自然元素和侧面，以及其文化元素和自然元素的相互作用。在如此扩展边界时，生态批评可以应对最重要的挑战——将自然与文化理解为交

织在一起的存在而非分离的二元论建构的两个侧面。要超越自然/文化的二分法，生态批评就不能仅仅聚焦于自然写作，而必须研究自然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文化在自然中所扮演的角色，像导向以自然为中心的文本一样导向文化-文学文本。^① 因此，“生态文学”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是指这类文学是“生态的”，是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它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种局部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尺度。这样，本书就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以自然为对象的传统的自然文学书写，而是超越题材对生态关怀的牵制，而将关注面扩大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诸多层面，考察生态意识在这个整全视域中所起的作用，力图在机械文明向有机文明的转向上作出自己独到的理解与贡献。人与自然、人类的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者、世俗生存与精神信仰的和谐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精神，生态文明的理想境界就包含在自然、世俗生存活动、超越性精神信仰这三者的动态平衡关系里，生态文明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一种高迈的存在论美学境界，而艺术与审美活动则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身心和谐、感性与理性和谐的

① Beyond Nature Writing, :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Edited by Karla Armbruster and Kathleen R. Wallac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1, p. 4.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文艺是人对世界的体验之表达的强化形式。

本论著从二元论（dualism）发生、发展及演变轨迹的考察入手，既涵盖文化/自然、语言/物、事实/价值等二元性对立，又涉及人自身内的二元性分裂，亦即主观/客观、理性/感性、生命/精神等领域，为文学中的生态关怀整合多种思想资源，从而重新界定文学的起源、功能、主体。主体的危机是与世界的危机一起发生的。从反对二元论出发，中西方的文学与文化批评逐渐走向生态批评。二元论并非仅仅强调差异，相反，它建立了一系列等级结构，因而是差异的异化模式。^① 本论著系统考察机械文明之后人类生存困境在文学中的体现，并试图从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出发，对主客观二元关系从对立到弥合、最后到超越的过程予以高屋建瓴的梳理，将宏观的理论概括与微观的文本分析相结合，凸显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综合努力。本论著以时代划分为纵坐标，以每个时代不同的代表人物为横坐标，以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为烘托，清理相关思想的渊源、发展及其艺术表现。全书以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心物二元性，及其对当代文明与生态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考察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救赎及其失效，涉及迪金森、叶芝、梅特林克、里尔克等文学大师对如何克服主客观对立的深度思考。第二章考察解构的

^①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Edited by Laurence Cou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19.

后现代主义，分别论述去绝对中心主义、元意识的解构、对自我的终极消除、多元并存的复调性等文艺学关键问题。涉及约翰·阿什贝利、马克·斯特兰德、大卫·安汀等主要的后现代诗人与作家。第三章探讨超越主体论的生态整体观的建设及其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集中论述美国生态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如瓦尔特·惠特曼、约翰·缪尔、约翰·巴勒斯、玛丽·奥斯汀等。

中西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的终极旨归，就在于通过各自的渠道，从不同层面上将已经分裂的人的自我重新带回存在的整体，亦即那“无价的平等、神圣、原初的具体之中”。至今，分离的范式依然统治者我们的思维和世界。从笛卡尔开始，主体的领域和具有广延性的事物的领域就分离了，前者被留给哲学和内心的沉思，后者属于科学认识的、测量的和精确化的领域。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人文主义的文化不再能够用客观知识的源泉滋养自己，同样，建立在知识的专门化的基础上的科学的文化则不能够反思和设想自身。主体的向内塌陷，同时带来了客体的异在化，也就是与人疏离和被掩去踪迹。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象仍然是人，而物则处于失踪状态，其它物种几乎没有在文学中显现为其本身的机会，只是被当做资源库和工具，那么，在一部分后现代文学和生态文学中，文学的功能已然发生了转变，它的目的不再如萨特所说的，“让世界与物进入非本质状态，成为行动的借口，而行动变成它自身的目的。花瓶在那里是为了让少女用优雅的姿态往里插满鲜花；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发生是为了赫

克托尔和阿刻琉能奋勇作战”^①，而是通过尊重物本身，让独立的具有主体性的物作为本身来显现，使主体的心意状态与客体的现身情态合一相契，从而使所有生命个体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主体性权利的可能空间。

本专著产生于严格的逻辑推演。读者要领会其要旨，须掌握下面的关键词并发现其中的内在关联：过程、生态、信仰。在以转述西方文论为普遍目的的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之中，本专著避免了被貌似客观的知识分解所淹没，而凸显面对中国经验时中国知识话语的建构能力。

^① 萨特：《萨特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5页。

目 录

自 序	001
第一章 现代主义:抵抗二元性	001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解构总体性	098
第三章 生态整体主义:万物互相效力的信仰重构	182
结语 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	290
主要参考文献	315
附录一:W.H.奥登诗选	327
附录二:马克·斯特兰德诗选	354
附录三:Ultimate Elimination of Ego	384
后 记	406

第一章 现代主义：抵抗二元性

第一节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modernity）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分期，按照福柯的说法，它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我所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点像希腊人叫作 ethos（气质）的东西。”^① 它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高效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但是，“现代性”又具有内在致命的矛盾，“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

^① 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34 页。

尔的时代精神，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变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①

葛兰西、韦伯、卢卡奇都认为，现代性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形式——技术理性——它对文化和社会生活整体有巨大的作用。技术理性所支配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线性观念。这种二元分立的对象化思维决定了人对自然采取的是剥夺、利用的经济学模式，而不再把它当做养育人类和万有的母亲。自然已经死亡。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第一次人类环境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大气、水、土壤、固体废弃物、有毒化学物品以及噪声、电磁波等物理性污染。这所谓的第一次环境危机，西方工业化国家采用环境保护措施基本予以控制或解决。但是，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面临的是第二次环境危机，它已经不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全球性困境，资源短缺问题开始出现，加上人口的暴增，地球作为孤独人类在茫茫宇宙中唯一一个家园，唯一可以依靠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经脆弱不堪。曾经丰满的母亲的乳房，干瘪塌陷了，呈现出荒漠的可怕枯黄颜色。臭氧层泄漏、二氧化碳增多、酸雨肆虐，扰乱了地球母亲该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41 页。

娅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娅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娅的头发，热带雨林和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被皆伐、消失，每天都有物种在灭绝。^① 失去森林的护卫，河流上游的水土开始大量流失，河流携带的泥沙淤积起来，使河床越来越浅，地下水位升高，地下水中的盐分就随水上升到表层土壤，结果土质盐碱化。

新的机械主义秩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自然母亲交给了死亡。日益扩张的城市在大地和山脉原来所在之处生长出高楼大厦，城市已成了自然的墓地。城市中的花草树木不过是类似于家畜的东西。而农村，生长的植物已不再是纯正的自然之子，而是化学和工业的后代，是工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为欲望强盛的城市提供消费原料的场所。海洋不过是人类的污水池，地球上最大的废品仓库，水生动物的受难之所，战争的广场。地球上能找到自然的地方只剩下那些数量有限的自然保护区了，它们仅仅是自然界仅存的避难所，有的还是以收容所名义出现的监狱和集中营。^② 回归自然已经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到仅存的自然的碎片中旅游漫步，勾起的仅仅是痛苦的乡愁与回

① 卡洛琳·麦茜特：《前言：1990》，《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王晓华：《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8页。

忆，甚至这种所谓的旅游有可能带来进一步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作为书写的对象已经基本消失，传统的以自然之美、以天人关系为主体的自然文学书写，也陷入了一个虚无困境，就像一个爱人已逝的哀情者对着虚空之墙独自抒情。而如何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的时代语境中，为自然书写找到充足的理由，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处发掘，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人与自我这四个层面上的新的和谐关系，才是生态文学研究所要真正面对的对象。对待自然与对待他人之间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它们是受同一思维模式的左右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其内在原因在于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如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能对朋友真正友善；一个连神灵都不敬畏的人，如何能指望他对他人保有尊重？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联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例如物种的灭绝——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影响。”^①

著名学者王晓华曾言，“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

① 皮特·布鲁克史密斯：《未来的灾难》，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做征服—认知—观照着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的共同特征。”^① 这种主体性包括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它们是传统人文主义的核心。而主体性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但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的意志和态度，也构成了现代性内部的二元紧张关系，其危机于是生发出了它自己的对立面，那就是以“否定的美学”为主导的现代主义文艺，它试图以批判来抵抗技术理性的宰制，抵抗工业文明对自然与人的双重异化，企盼重新找回内在与外在的和谐关联，弥合主客对立所带来的一系列可怕后果。卡林内斯库曾指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他说：“可以肯定的是，在 19 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② 资产阶级现代性延续的是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关切可测度的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崇拜理性、行动与成功。而审

① 王晓华：《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02 页。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48 页。

美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抗与厌恶的“否定”态度。标举艺术自律的“为艺术而艺术”便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第一个宁馨儿。在失去信仰支撑的当代，文艺的动力就是通过创造给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赋予一种象征性秩序，抵制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为迷失于物质主义荒原的现代人提供终极意义和价值旨归。这种有关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便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出发点，即“悲观主义世界观，在日益恶化的状况中，悔恨化为绝望，最终变成危机和天启”。具体地说，就是深刻意识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这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因此，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全面否定的态度”。^①

这种否定性来自于现代主义文化的自我意识对经验的侵袭，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艺发现，经验与认识之间具有巨大的鸿沟，人们对生活的感觉方式与用来表达那一感觉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似乎无法改变的张力，“现代感受性的特征是一种急迫而痛苦的差距感，该差距存在于经验与意识及用经验的强烈感受来补充理性意识的欲望之间，那么，这本身就标明了经验对意识必要而无法逃避的依赖。而且，反之也是如此。经验与自我认识之

^① 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